



张炳火 主编

良渚博物院 编著

良渚文化刻画符号
Pictographs of Liangzhu Culture

张炳火 主编

良渚博物院 编著

良渚文化刻画符号

Pictographs of Liangzhu Cultur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良渚文化刻画符号 / 张炳火主编; 良渚博物院编著.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ISBN 978-7-208-12665-7

I. ①良… II. ①张… ②良… III. ①良渚文化—研究 IV. ①K871.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64248 号

责任编辑 黄玉婷 齐书深

特约编辑 左亚琳

装帧设计



未来海岸文化传播

沈钰浩 徐海波

良渚文化刻画符号

张炳火 主编 良渚博物院 编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 人民出版社 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制版印刷

开本 889×1194 1/16 印张 51 插页 4

2015年4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2665-7 / K · 2304

定价 980.00元

目录

004

序

008

良渚文化刻画符号研究课题综述

026

导语

030

陶器篇

032

象形符号

124

抽象符号

614

其他符号

662

石器篇

694

玉器篇

712

刻符器物补遗

736

关于良渚文化刻画符号的文献资料

742

索引

812

后记

张炳火 主编

良渚博物院 编著

良渚文化刻画符号

Pictographs of Liangzhu Culture

《良渚文化刻画符号》编委会

主 编 张炳火

顾 问 曹锦炎

执 行 主 编 蒋卫东 马东峰

执行副主编 陈耿忠 郭青玲 唐 琳

编 委 (按笔画顺序排列)

丁金龙 丁 品 王宁远

王明达 方向明 刘 斌

宋 建 陈志敏 陈 杰

陆春松 芮国耀 张 敏

林留根 周 苏 赵 晔

夏 勇 徐新民 楼 航

执 行 编 委 夏 勇 周 苏

摄 影 沈钰浩

拓 片 王可兴 夏 勇

摹 本 方向明

目录

004	序
008	良渚文化刻画符号研究课题综述
026	导语
030	陶器篇
032	象形符号
124	抽象符号
614	其他符号
662	石器篇
694	玉器篇
712	刻符器物补遗
736	关于良渚文化刻画符号的文献资料
742	索引
812	后记

序

序

张炳火

1936年,施昕更先生最早在良渚发现了古文化遗址,并于1937年、1938年发表了《远古文化遗址试掘简录》及《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1959年,由夏鼐先生在长江流域考古工作会议上正式命名为“良渚文化”。在此后较长的时间里,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有关良渚文化的考古和研究仍不系统和完善,尤其是没有高等级墓葬的考古资料可以参照,因而对于当时良渚文化及与周边同期文化的区别、社会发展到什么高度等还存有模糊的认识。直到1973年在江苏吴县发掘草鞋山良渚文化大型墓葬,发现了随葬的大量精美玉器与陶器、石器,一直被称为周汉古玉的良渚玉器才由此得到了正名,学术界对于良渚文化内涵也开始了重新审视。随后,江苏寺墩、上海福泉山等一系列重要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又都促进了考古界对良渚文化这支环太湖流域古代文化的思考,对其生产力、社会复杂化程度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台阶。尤其自1986年以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相继对反山、瑶山、汇观山、文家山、卞家山、庙前遗址,塘山土垣及制玉作坊等进行考古发掘,在良渚遗址区范围内,发现了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墓葬、祭坛、基址和居址,特别是2007年良渚古城的发现,更使这一区域的文化内涵得到了极大的扩充,为良渚文化研究与中国文明的起源研究提供了丰富、翔实材料。

几乎在良渚古文化遗址发现的同一时期,有识者也曾提出陶器刻符甚至是古代文字的问题。施昕更先生在他的考古报告中公布了他发掘出土的5个陶器刻符为记号文字。同时代学者何天行先生在《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的专著中认为“除有记号文字作×,+,V,或L的黑陶以外,还发见一只有象形文字的陶器……发现有这样原始形的图象文字”,并认为“尤足证为文字无疑”,“且当在甲骨文字之先”。受到当时著名学者卫聚贤先生的赞同,认为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这在当时也曾轰动一时。1992年浙江余杭安溪确认百亩山玉璧出土地点后,证实了国内外所藏多件良渚文化玉器刻符的真实性。随着良渚文化遗址考古研究的深入,学者们不断地在浙江、江苏和上海的考古发掘中获得较多形态各异的刻画符号,据这次课题统计,刻画在陶器、石器、玉器上的刻符总数已经超过600件。

多年以来,学术界对良渚文化是否已迈入文明阶段一直多有争论,其原因主要还是在

对文明的定义，或者说文明的标准上纠缠不清。通常来说，认同文明时代的几个因素有城市、礼仪性建筑、金属和文字。就良渚文化研究而言，城市、礼仪性建筑已有考古资料的支持。虽无金属的发现，但根据良渚人制作的精美的玉器和森严的用玉制度，又有学者提出了“玉器时代”的学术概念，多次撰文指出“玉器时代”的出现在中华文明的兴起中具有独特性，配伍严密的玉礼器是社会生产力提高和社会结构复杂化等变革的体现之一，是礼制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而对于文字，学术界一般认为人们早期是通过图画刻或写在石头、木头等材料上，用以记录那些值得注意的事件，即“图画文字”；或者让图画中形态逐渐变得简洁、抽象，并且象征着自己对事物的想法，用于表达一定的意思，即表意文字。这两种现象，一方面我们会时常从已出土的器物中发现，另一方面，这些承载着图形或者“文字”的材料不少却因年代的久远而逝去。因此，我们也只能从已发现的尚留存的陶器、石器、玉器的刻符上去寻找它的踪影和意义。综观上述各方面资料，我们可以设想，在那个已经有了规模恢宏的城市和建筑，并具有较为复杂的分工和社会等级的时期，那么多的图形和刻符是否被赋予了诸多的含义，是否就是文字的雏形？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国内对文字起源的研究已形成这样一种观点：成熟文字大约成形于商代，最早也是在夏代。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在各地虽然都有大量刻画符号的发现，但从结构和意义上分析，还缺乏体系。以半坡、姜寨遗址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刻画符号，造型以简单刻画的几何指事形符号为主，但表意和运用范围有限。大汶口文化中虽有象形符号，但仅限于少数器物。早年也有学者根据以往有限的考古资料，提出了中国文字起源的一元论、二元论等不同观点。后来不断的考古发现证明，这些观点都是不够客观、不能符合历史实际的。

苏州澄湖所出贯耳壶和余杭南湖所出圈足罐上的成组符号，曾引起古文字学家的热议。历史学家李学勤就曾将南湖出土陶器上的 8 个符号释读为“朱旗践石，网虎石封”。山东丁公陶符和江苏南荡陶符时代与良渚文化年代下限接近，它们的出土为原始文字出现的时代提供了令人振奋的证据。多个符号整齐、成组出现，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突破了单个符号孤立存在的情况，很有可能已达到成词、成句的文字发展阶段，文字体系可能开始建立。本图录收集的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出土石器上出现的字符，排列有序，重复出现，符合文字的一些特点。有专家认为，从原始文字的发展阶段来看，

已经处于高级阶段。它虽不能说就是中国文字的前身，但具备了文字特有的表意功能，进一步证实原始文字的存在。这一大批材料的出现，改变了以往认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尚无成体系符号的认识。同时，这些新出现的材料也说明，不管是史前符号系统还是原始文字系统，它们的发展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和苏秉琦先生提出的“满天星斗”说的复杂性是相一致的。

随着中国考古学在 20 世纪 70 年代左右逐步完成了田野资料的积累，至 80 年代末迈入了由苏秉琦先生提倡的“考古学区系类型”建立阶段，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学术界又掀起了文明起源和文明社会的大讨论。面对愈加深入的讨论，学者们也愈来愈注意到考古资料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尝试从不同角度多方考察遗物、遗迹，以获得更多的信息。刻画于陶器、石器、玉器和骨器等多种质地上的符号，广泛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不同阶段，如何从宏观和微观上利用好如此丰富的考古资料，成为文明起源讨论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对系统整理、发表这些刻符资料提出了要求。

从目前收集、整理的情况来看，良渚文化时期出土刻画符号较多的遗址有湖州昆山、塔山遗址，杭州余杭卞家山、庙前、美人地遗址，嘉兴新地里、庄桥坟等遗址。值得注意的是，嘉兴地区出土良渚刻符的遗址不在少数，相比之下，良渚遗址群这一中心区，虽然有庙前和卞家山两个遗址所出刻符数量较多，但分布的遗址数量和刻符总量要少于嘉兴地区，体现了一定的地域特征，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囿于历年来良渚文化刻画符号资料的发表比较零碎、不成系统，而学术界对于这一方面的资料需求又较为迫切，因此，全面收集、整理良渚文化刻画符号的考古资料并将之发表出来，就成为一名富有学术意义的基础性工作。据此，杭州城市学研究会余杭分会、良渚研究院启动了“良渚文化刻画符号研究”课题，并得到了浙江、江苏、上海考古及博物馆同行的认同和支持。这项工作前后历时四年，收集、拍摄工作涉及苏、浙、沪多个博物馆和考古机构，可以说《良渚文化刻画符号》是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成果。

我们相信《良渚文化刻画符号》的出版，将会给专家学者对良渚时期有否文字的研究提供基础性资料，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具有学术价值的。

综述

--	--

良渚文化刻画符号研究课题综述

夏 勇

一、课题缘起¹

三个原因促成了本课题的立项。

第一，良渚文化时期的刻画符号向来是太湖流域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史前刻画符号对于中国文字起源研究意义重大，是新石器时代各考古学文化区域类型互相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内容。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在全国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有过多次热烈讨论。

考古学上定义的“文明”通常以城市、金属器、礼制建筑和文字作为标准。具体到良渚文化这一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继反山、瑶山和汇观山等高等级的墓葬和祭坛发掘后，庙前、卞家山、文家山等居址的发现和发掘丰富了良渚遗址群作为良渚文化中心区域的功能结构。基于良渚文化异常发达的玉器制作和严格分配的玉器使用制度，有学者在 80 年代提出“玉器时代”一说，认为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不仅制作精美，其背后更蕴含了完善的礼制制度，是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重要载体之一。2007 年良渚古城的发现则实证了良渚文化已进入早期文明阶段。在高等级墓葬、用玉制度、城址等各方面的考古学资料都相对完善的情况下，学术界对于良渚文化时期的“文字”——刻画符号的资料收集与研究就显得较为迫切了。

其次，良渚文化刻画符号多年来有大量的发现。

早期以苏州澄湖所出贯耳壶和杭州余杭南湖圈足罐上的组合符号为代表，学者们对此多有讨论，或认为这就是当时的“原始文字”。尤其是近年来余杭卞家山、庙前，湖州千金塔地和平湖庄桥坟等遗址的新发现，增加了刻符的数量和种类，为进行这方面的资料收集和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而先前的发现和刊布因资料所限，较为零碎。

第三，良渚研究院自 2011 年成立以来，便致力于夯实学术基础，拓宽、深化良渚文化的研究方向和内容。

刻画符号研究较之良渚文化陶器、玉器等器物研究，城址、墓葬和居址等聚落研究，相对比较

1. 课题最初名为“良渚文化刻划符号研究”，具体名称选定为“刻划符号”而不是“刻画符号”，基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刻”、“划”与“画”是两种书写的方式，为动词形式。刻划符号的发现由来已久，材料也丰富。而“画”相对较少，并且相对“刻”、“划”更易剥落，不易保存。其次，良渚文化遗址中尚未出土过彩绘画符。总体而言，北方的新石器文化多是彩陶传统，如青海柳湾的彩陶画符。良渚文化的上下文化谱系中基本不见（张家港东山村遗址马家浜文化堆积中出有彩绘石器，现藏张家港博物馆），没有软笔彩绘的文化传统。但后来认识到，“画”不仅是指彩绘，以工具在器物表面阴刻而成的图案同样是“画”。因此课题名称改为“良渚文化刻画符号研究”。

薄弱,但结合良渚博物院作为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先天优势和良渚研究院的专门性,考虑到学术研究的需要,立此课题,辑图成录,为广大研究者服务,乃良渚博物院和研究院的责任所在。

二、中国史前刻画符号研究简述

1. 刻符早期发现的简要回顾

在近代学术史上,最早引起世人对刻符关注的,是 19 世纪末河南安阳地区大量发现的甲骨文。在考古学上,第一个对刻符有记录的是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他在 1925 年出版的《甘肃考古记》中记述了甘肃朱家寨遗址出土的骨牌和辛店期所出的彩绘符号²。1931 年,李济主持山东城子崖遗址发掘,有所获³。

国内最早讨论陶器上符号的学者是唐兰,他在 1933 年为商承祚《殷契佚存》作序时提出:安特生《甘肃考古记》中收集的辛店期陶瓮上有文字,与商周文字同一本源而较古拙,年代约在四千余年以前。⁴1937 年,浙江施昕更与何天行相继于报纸上发表杭县遗址发掘及陶器刻纹的文章⁵。一直到西安半坡遗址大量陶符出土以前,国内对刻符研究裹足不前,盖因考古发掘为时局所困,田野资料匮乏,远不如甲骨文

2. [瑞典]安特生著、乐森珥译:《甘肃考古记》,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7页。

3.按《城子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年出版,1993年影印版)第53—54页:“在所收集的二万余块陶片,共有八十八片上刻有记号。按它们的形状分别可得十八类。……在这八十八件中只有图版十六:12,1a与1b是前期(即下文化层)的。”第72页:董作宾、郭宝钧认为上层所出“陶文,则与甲骨文早期为近。……城子崖上层文化与殷文化是一个系统,至少是很接近的”。

4.商承祚:《殷契佚存》,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33年版。据宋镇豪、段志洪主编:《中国古文字大系·甲骨文献集成(第一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0页),这一观点在他的《古文字学导论》(齐鲁出版社1981年版)中再次提出。

5.施昕更:《杭县第二区远古文化遗址试掘简录》,上海《时事新报·古代文化》1937年4月14日、4月21日;何天行:《杭县第二区的史前遗存与黑陶文化》,上海《时事新报·古代文化》1937年5月19日。这件黑陶豆购买自古董商,对于豆盘口沿上的刻符,施昕更在1937年的发掘报告《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第25页已说明:为何天行所购得,并不是发掘得来。又如牟永抗在《良渚文化的原始文字》(收入《牟永抗考古学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中加注:从图片观察,这组抽象符号似为后代新加,故其笔画及构架与此后发现诸标本完全不同,作者补注。又见牟永抗:《半个世纪后的思考》,《江南文化之源——纪念马家浜遗址发现五十周年》上卷,中国摄影出版社2011年版。对照刻符拓片,按郭沫若所言:“甲骨文是用刀刻在骨质上的,故来得瘦硬;金文是用笔写在软坯上而刻铸出来的,故来得肥厚而又锋芒。甲骨文上乃至陶器上偶有笔写的字,那感触便和金文差不多。”(《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且良渚文化发现70余年来,再无发现类似符号。

文集中出土，士人热心三代而成果斐然。

1949 年以后，中国考古学随着时局稳定进入了一个黄金发展期。新石器时代各个时期遗址大量发现、发掘，刻画符号资料随之丰富，出土地点之多以至于历来学者收集完整者很少，对特定考古学文化的刻画符号资料进行系统整理归类的工作也比较薄弱。

相比国内其他地区，新石器时代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地区出有刻画符号资料的遗址数量也相当丰富，具体有：

河姆渡文化：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⁶。

崧泽文化：上海市青浦区崧泽⁷、福泉山遗址⁸，江苏省昆山市姜里遗址⁹、江阴市南楼遗址¹⁰，浙江省余杭区石马兜遗址¹¹等。

良渚文化：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南湖遗址¹²，瓶窑吴家埠¹³、卞家山¹⁴、葡萄畈¹⁵、美人地遗址¹⁶，良渚庙前、马家坟、茅庵里遗址¹⁷，临平玉

6.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

7.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崧泽》，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8.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

9.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昆山市文物管理所、昆山市张浦镇文体站：《江苏昆山姜里新石器时代遗址2011年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1期。

10.江苏江阴南楼遗址联合考古队：《江苏江阴南楼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7期。

11.《良渚遗址群石马兜2004—2007年发掘》，《浙江考古新纪元》，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12.余杭县文管会：《余杭县出土的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的陶器刻画符号》，《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该报道还发表了瓶窑北湖、长命大观山、小林茅山三个遗址点所出器物的刻画符号。

1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吴家埠新石器时代遗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建所十周年纪念（1980—1990）》，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14.赵晔：《探秘卞家山》，《东方博物》第24辑，2007年第3期；《良渚遗址群卞家山2002—2005年发掘》，《浙江考古新纪元》，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15.葡萄畈遗址情况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古城遗址2006—2007年的发掘》，《考古》2008年第7期。但简报中未提到有刻画符号，实物见良渚博物院第一展厅。

1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资料。

17.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遗址群考古报告之四：庙前》，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

架山遗址¹⁸；嘉兴市平湖戴墓墩¹⁹、庄桥坟遗址²⁰，海盐龙潭港²¹、仙坛庙遗址²²，海宁达泽庙²³、金石墩²⁴、东八角漾遗址²⁵，桐乡叭喇浜²⁶、新地里²⁷、小六旺²⁸、姚家山²⁹、董家桥³⁰等遗址；湖州市塔地³¹、昆山³²、花城遗址³³；上海市金山区亭林³⁴、寺前遗址³⁵，闵行区马桥遗址³⁶，松江区广富林遗址³⁷，青浦区福泉山³⁸、

18.楼航、葛建良、方中华：《浙江余杭玉架山发现良渚文化环壕聚落遗址》，《中国文物报·文物考古周刊》2010年2月26日。

19.平湖市博物馆：《浙江平湖戴墓墩良渚文化遗址发掘报告》，《文物》2012年第6期。共有十件刻符陶器发表，其中发掘六件，采集四件。

2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湖市博物馆：《平湖庄桥坟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崧泽·良渚文化在嘉兴》，浙江摄影出版社2005年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湖市博物馆：《浙江平湖市庄桥坟良渚文化遗址及墓地》，《考古》2005年第7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湖庄桥坟遗址发现良渚文化原始文字》，《中国文物报·文物考古周刊》2013年6月21日。

2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海盐县龙潭港良渚文化墓地》，《考古》2001年第10期。

22.王宁远、李林：《海盐仙坛庙遗址的发掘》，《崧泽·良渚文化在嘉兴》，浙江摄影出版社2005年版。

2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宁市博物馆：《海宁达泽庙遗址的发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长征出版社1997年版。

24.海宁市博物馆：《浙江海宁金石墩遗址发掘报告》，《东南文化》2003年第5期。

2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宁市博物馆：《海宁东八角漾遗址发掘报告》，《崧泽·良渚文化在嘉兴》，浙江摄影出版社2005年版。

2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乡叭喇浜遗址发掘》，《沪杭甬高速公路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

27.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地里》，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

28.该遗址未经发掘，所出石质带刻符耘田器为采集所得，资料见王宁远、周伟民、朱宏中：《良渚文化两件特殊的“耘田器”》，台北《故宫文物月刊》2006年第24卷第5期。

29.遗址情况可见王宁远、周伟民、朱宏中：《桐乡姚家山发现良渚文化高等贵族墓葬》，嘉兴市文化局编：《崧泽·良渚文化在嘉兴》，浙江摄影出版社2005年版。但刻符资料未刊详细，承蒙桐乡博物馆告之。

30.田正标：《桐乡市董家桥良渚文化及春秋战国时期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4》，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第182、183页。

31.刻符资料未刊，实物现存湖州博物馆。

3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山》，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

33.湖州市博物馆隋全田：《湖州花城发现的良渚文化木构窖藏》，《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张葆明：《花城族徽初探》，《湖州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

34.孙维昌：《上海金山查山和亭林遗址试掘》，《南方文物》1997年第3期；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上海金山区亭林遗址1988、1990年良渚文化墓葬的发掘》，《考古》2002年第10期。

35.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上海青浦区寺前史前遗址的发掘》，《考古》2002年第10期。

36.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马桥遗址第一、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马桥——1993—1997年发掘报告》，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版。

37.周丽娟：《广富林遗址良渚文化墓葬与水井的发掘》，《东南文化》2003年第11期；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上海松江区广富林遗址1999—2000年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10期；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上海松江区广富林遗址2001—2005年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8期。

38.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

西漾淀遗址³⁹；江苏省苏州市澄湖遗址⁴⁰，昆山市太史淀⁴¹、赵陵山⁴²、绰墩⁴³、少卿山遗址⁴⁴，常州市武进寺墩遗址⁴⁵等。

史前遗址、遗迹能够保存至今的数量已远小于当时，考古发掘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但依然可以发现，到良渚文化时期（公元前 3300—2300 年），出有刻符的遗址数量剧增。结合其他考古资料与研究，可以认为随着社会发展的复杂化、社会分工的专门化、严格的礼仪制度的形成与垄断性神权的出现，先人对于标记、记事等功能的符号需求也大增。因此，在此时期能够发现规格与随葬品数量、质量远超过去的高等级墓葬，乃至超大型城址，社会已进入早期文明阶段。

在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刻符资料发现更早，刊布也早⁴⁶。这些丰富、翔实的材料，使研究者从更大范围、更高角度发掘出刻符背后的含义，成果斐然。各种观点的互相碰撞、研讨，经过数十年的积累，已经使我们可以归纳出学术界的主要脉络。

2. 刻符讨论的主要观点

1949 年以后至 80 年代，学术界讨论符号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来自仰韶文化的半坡、姜寨等遗址以几何形符号为主的资料，以及大汶口文化的诸城前寨、莒县陵阳河等遗址出土的以象形符号为主的资料。前者以几何指事形符号为主，数量较多；后者数量少，以象形、图画符号为主。总的来说，讨论是从三个层次出发的：首先是从符号最直观的结构、形体；其次，符号的性质和功能；第三，符号与原始初文和文字的联系。多年的学术争论围绕着两个核心问题：

39.西漾淀遗址资料未刊，转引自杜金鹏：《良渚文化神邸与祭坛》，《考古》1997年第2期。杜文线图出自孙维昌：《良渚文化陶器纹饰研究》图31.2，《上海博物馆馆刊》1992年第6辑。

40.南京博物院、吴县文管会：《江苏吴县澄湖古井群的发掘》，《文物资料丛刊》第9辑，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41.陈兆弘：《昆山太史淀文化遗址考察》，江苏省考古学会、江苏省博物馆学会编：《文博通讯》1982年第3期；陈兆弘：《对昆山古文化遗址的认识》，江苏省考古学会编：《江苏省考古学会第四、五次年会论文选》，1985—1986年。后文引自前文。

42.江苏省赵陵山考古队：《江苏昆山赵陵山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1936—1996）》，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发掘报告最近已出版，见南京博物院：《赵陵山——1990—1995年度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

43.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昆山绰墩遗址》，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

44.王华杰、左骏：《昆山少卿山遗址新发现的良渚玉璧刻符》，《东南文化》2009年第5期。少卿山遗址的发掘情况见苏州博物馆、昆山市文化局、千灯镇人民政府：《江苏昆山市少卿山遗址的发掘》，《考古》2000年第4期。

45.南京博物院：《1982年江苏常州武进寺墩遗址的发掘》，《考古》1984年第2期。

46.限于篇幅，不再列出。参见何靖：《中国文字起源研究》第四、五、六、七章，巴蜀书社2011年版。